

哲学

的

应用与创新

YINGYONG YU CHUANGXIN

主 编 / 刘可风 朱书刚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哲学

的

应用与创新

第十次全国应用哲学理论研讨会文集

主 编 / 刘可风 朱书刚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的应用与创新/刘可风,朱书刚主编.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4
ISBN 7-5005-8104-1

I. 哲... II. ①刘... ②朱... III. ①应用哲学—文集 IV. ①B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5522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036

发行处电话:(010)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010)64033436

湖北南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电话:(027)88324370 88320800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 36.5 印张 656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武汉第 1 次印刷

定价:50.00 元

ISBN 7-5005-8104-1/B·0042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南财文化负责调换)

全国第十次应用哲学理论讨论会留念

2003.11 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全国第十次应用哲学理论讨论会留影（2003年11月）



1948年6月，以邓小平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原局决定并报经中共中央批准筹建中原大学。由第二书记陈毅同志担任中原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1948年8月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同志在河南宝丰正式宣布中原大学成立。1949年5月至8月中原大学迁往武汉。1953年，在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中，以中原大学财经学院、政法学院为基础，荟萃中南地区六省多所高等学校的财经、政法系科，分别成立了中南财经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1958年，中南财经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及中南政法干校、武汉大学法律系合并成为湖北大学。1971年湖北大学改名为湖北财经专科学校。1978年1月，湖北省批准学校更名为湖北财经学院，并成为首批恢复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高校之一。1979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湖北财经学院由财政部及湖北省双重领导，以财政部为主。1984年12月，以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为基础，恢复重建中南政法学院，归司法部领导。1985年9月，湖北财经学院更名为中南财经大学，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了校名。2000年2月，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的方案，中南财经大学和中南政法学院合并，并于2000年5月26日组建成为新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代 序 言

发展应用哲学，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与创新

——在第十次全国应用哲学理论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湖北省社联副主席、湖北省哲学学会会长：张 武

(2003 年 11 月 8 日)

在全党认真贯彻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掀起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 110 周年之际，第十次全国应用哲学理论研讨会在这秋高气爽、菊花盛开的江城武汉隆重开幕。我谨代表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和湖北省哲学学会对第十次全国应用哲学理论研讨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专程来湖北莅临这次学术盛会的著名专家学者及到会的各位领导，向来自全国的各位代表及到会的各位来宾表示诚挚的欢迎！这次研讨会得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与政治学系和哲学研究所，中共湖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部，江汉大学政法学院，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中共宜昌市委党校，清江水电开发公司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得到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领导的鼎力支持。作为协办单位特向筹备和组织这次学术盛会的发起和主办单位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今年是应用哲学研究兴起 20 周年纪念。20 年前湖北企业界根据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在湖北省哲学学会支持下率先举起应用哲学研究的旗帜，于 1983 年 10 月成立了“湖北大型企业应用哲学研究会”。随后，又在有关部门支持下于 1985 年 4 月在武汉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应用哲学研讨会（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局长的卢之超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以后相继在安徽、辽宁、广东、上海、四川等地召开了第二至第九次应用哲学研讨会，并在中国马哲史学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应用哲学研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湖北大型企业应用哲学研究会”

的成立和第一次全国应用哲学研讨会的成果的影响和意义日益凸现。这次中国马哲史学会应用哲学研究会在湖北举行以理论创新与部门哲学发展为主题的“第十次全国应用哲学理论研讨会”既是对湖北哲学界和企业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率先举起应用哲学研究的旗帜的光荣历史与创新精神的尊重与鼓励,更是对湖北加强哲学应用与应用哲学研究,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和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创新的有力推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伟大变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人类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特征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时代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哲学的根本任务不仅在于科学地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能动地改变世界。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经院哲学,而是生活哲学,大众哲学,实践哲学,应用哲学。毛泽东同志说得好,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武器。哲学的应用和应用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是统一的,其本质也是同一的,都是要实现哲学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当代中国的应用哲学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的和最关键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正确处理源与流的问题。源,毫无疑问,是当代的实践;流,则是前人创立和遗留下的精神财富。

在哲学的应用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对流的汲取。就哲学思想领域而言,中国的先哲们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思想财富。许多精辟观点,反映了前人对人类社会进程中的规律性认识和对真理的追求,值得令人认真研究和吸取。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的本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知行统一的实践观,多元兼容的文化观,义利统一、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德行践履、心理归一的道德观等等,无疑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思想之“流”。我们应当通过我们的研究、开掘和推广,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闪亮理念和观点,走向世界,使之具有世界意义。

我们更应该重视哲学的源的问题,重视新的实践、新的科技、新的现实情况对

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

进入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发展创新的机遇。我们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也不赞成“回到马克思”的“回归论”。我们坚持把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的创新论。坚持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同研究当代世界和中国现实的新变化、新走向、新特点、新问题结合起来,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去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当前,我们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亟待从哲学高度作出回答。

一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这三大时代潮流和态势带来的新变化、新问题;

二是以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为主要引领的现代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变化、新问题;

三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因受到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双重威胁而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

四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科学把握的问题;

五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新自由主义”、“新左派”等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提出的新问题;

六是如何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问题;

七是如何解读和研究马克思哲学原创文本的问题;

八是在哲学受到冷落和感到困惑的氛围下,如何振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等等。

总之,实践呼唤哲学,时代呼唤哲学;人民需要哲学,民族需要哲学。哲学是一个民族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没有哲学的发展和繁荣,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底蕴的支撑,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伟大复兴!

湖北哲学界是全国哲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以李达、陶德麟等为代表的湖北哲学工作者为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与创新,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出新的贡献。

目 录

第一编 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陶德麟 (3)
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邓剑秋 (1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学习中共十六大报告的理论思考	朱传荣 (21)
视野·论域·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	
三个方法论问题	汪信砚 (29)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雍 涛 (40)
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及其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深化	徐卫国 (49)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问题及未来走向	沈湘平 (58)
浅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环境	吴静波 周正艳 (68)
对毛泽东应用哲学的一点认识	李步楼 (74)
当代中国的思维方式变革	董德刚 (80)
论邓小平的哲学思维和理论创新	何捷一 (87)
江泽民经济价值观论纲	朱有志 邹智贤 (96)
思维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陶笑眉 (105)

理论创新需要创新思维	孙洪敏 (112)
“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创新··	郑明珍 (119)
社会基本矛盾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释义	陈章亮 (125)
马克思主义人本观对传统人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王建辉 (134)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涵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潘绍龙 李国亮 (142)

第二编 哲学应用与应用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应用哲学的研究对哲学研究的推动	黄枏森 (151)
继续推进应用哲学的创新研究	郝侠君 (157)
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的实质:	
理论与实际创造性结合的“艺术整体”	郭国勋 (164)
国内部分学者谈“应用哲学”(摘要)	徐厚德 (170)
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灵魂	金志华 (190)
论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	陈 静 (196)
从儒家心性之学与事功之学的关系看哲学之用	姚才刚 (201)
走向应用:二十一世纪哲学发展的新趋势	
——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性特征	屠春友 (206)
哲学应用的新视野	
——实体性哲学向主体性哲学的转向	邵晓光 (212)
论应用哲学兴起之根据、定位和路向	王晓云 (219)
建构应用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	
“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	左亚文 (229)
试论应用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工作方向	邹吉忠 (238)
应用哲学教学与研究应注重的几个方面	徐 春 (244)
论感觉的形成机制	陈金清 (248)
面向生活世界	
——哲学应用研究提纲	马兆民 刁连堤 (260)
试论马克思的应用哲学方法传统	王桂泉 (267)
唯物辩证法应用研究	
——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辩证思考	梁雪影 (273)

从唯物辩证法中分离出应用辩证法

- 关于应用辩证法定位及其称谓问题的探讨 王鲁宁 (279)
- 应用哲学新视阈：“思想政治工作价值论”研究之凸显 唐志龙 (285)
- 大学课程国际化与民族性冲突问题的哲学研究 蒋雪岩 (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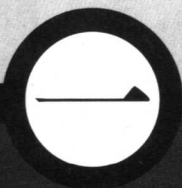
第三编 部门哲学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研究

- 现代科技实践的伦理挑战与回应 刘大椿 (301)
- 论市场经济领域中道德的适度定位问题 刘可风 (311)
- 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学”述评 王雨辰 (318)
- 货币幻象的背后
- 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历史哲学解读 张 雄 (326)
- 技术创新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不竭动力 齐金堂 (336)
- 经济增长的价值前提
- 略论佩鲁关于经济增长合理性
- 与人的发展关系的思想 胡贤鑫 (342)
- 试论产权的终极本质 刘敬鲁 (351)
- 论环境伦理思想对环境法的影响 陈食霖 (357)
- 浅论科技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陈施宇 (362)
- 三峡伦理研究发轫 夏澍耘 周向阳 (366)
- 略论波伏娃的存在主义伦理学的“自由”思想 方 珏 (371)
- 简论作为政治合法性之现代形态的法理合法性 刘 斌 (381)
- 建构高校校规合法性的理性思考 彭志忠 胡余清 (391)
- 发展哲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杨 娅 (396)
- “群众利益无小事” 沈培新 (403)
- 浅论领导哲学的基本问题 高 斌 (406)
- 罗尔斯论国际正义 袁银传 蔡红艳译 (412)
- 权力与暴力：美国对外干预政策的哲学诠释 曾宪洪 (420)
- 论德治和法治的结合与人的全面发展 吴培爽 (426)
- 矛盾调和方法论 万小梅 (432)
- 论经济哲学研究如何深入 陈太福 (438)
- 辩证法视野中的所有制问题 张荣洁 (445)

管理学人性假设新探	刘志光 (453)
黄金法则与管理智慧	蒋 谦 (459)
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哲学思考	孟庆艳 (468)
后发者的赶超之要	韩东屏 (474)
从“思辨哲学”到“文化哲学”的转向	肖建华 (483)
孔子论德育与智育的关系	
——学校德育反思的一个侧面	康 庆 (494)
孟子“仁政”思想述评	阮 航 (502)
试论王夫之对张载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罗红梅 (509)
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社会契约批判思想	张朝举 (517)
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述评	张 佳 (524)
企业道德责任问题初探	解丹琪 (529)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向度和价值向度	詹宏伟 (537)
论解救现代人的生存危机的路向	朱书刚 (543)
第十次全国应用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万健琳 席丽娟 (553)
中国“和平崛起”的哲学思考	宋叶萍 (566)

后 记	(575)
-----------	-------

第



编

理论创新与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 陶德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在国内外已有许多成果,但研究者的视角和切入点有所不同,观点和结论也有所不同。这些歧异的深层原因是对一系列前提性问题的理解的歧异,以及由此造成的方法论上的歧异。讨论这些歧异,有助于研究的深化。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问题

在有些研究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和正在继续的过程,而是尚未实现的理想和有待规划的工作。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哲学是从苏俄传来的,主要的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而是恩格斯的哲学、列宁的哲学、布哈林的哲学,以及其他转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则主要是斯大林的哲学,以及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写出来的苏联哲学教科书。至于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李大钊、李达、瞿秋白、艾思奇等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毛泽东的哲学,也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哲学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相去甚远,实际上是一种变形走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于马克思本人著作中表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回事。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迷途知返,亡羊补牢,重新解读马克思本人的全部文本,找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然后才有资格开始谈中国化的问题。

笔者的质疑有如下几点:

1. 苏俄并不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惟一渠道,从这个渠道传来的也并非没有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国人直接翻译和研读了马克思本人的许多重要著

作,并非只知道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教科书。这是史实问题,并不复杂,一查就明,这里无须罗列。

2. 说只有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表述的哲学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表述的都是赝品,中国人一直以赝为真,以致误入歧途,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1)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什么时期的马克思著作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对这个问题学术界的意见也并不一致。如果肯定马克思某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对马克思其他时期的哲学思想又该如何看待?(2)断言恩格斯的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有原则分歧的文章,国内外已经作得很多(例如说他们的分歧是“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分歧、“实体思维方式”与“实践思维方式”的分歧、“人本主义”与“物本主义”的分歧等等)。这些文章的论点是否站得住脚,这里不拟具体论及,在此只提一个问题:恩格斯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与马克思合写的,或者是经马克思本人审读认可并高度赞扬的,马克思怎么可能容忍他在原则问题上歪曲马克思主义而不加纠正?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也一贯遵循了马克思的根本思想,又有何歪曲之处?(3)列宁的哲学思想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有所增益、有所发展的,这种增益和发展诚然有它的侧重点,但根本原则与马克思的哲学并无二致,歪曲之处又何在?(4)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表述确有严重的缺点,但这些缺点远不足以否定他的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说他的哲学思想是有严重缺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可,说他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赝品则不可。顺便说到,人们常常以《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为标本,而不提斯大林的其他著作,例如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的哲学思想,这也有欠公平。(5)中国人对苏联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并不是盲目信奉、亦步亦趋的,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哲学观点就有很多批评,更不用说对苏联教科书和《简明哲学词典》的批评了。中国人在八十多年里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何尝真伪不辨,误入歧途?

3. 中国人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背景下,为了救亡图存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世界上的学说多矣,中国人何以对马克思主义特别垂青?就因为中国人需要拿它做思想武器。现在有些学者不大喜欢“武器”这个词,似乎一说“武器”就有污学术殿堂的纯洁,可是马克思本人就说他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当时中国人是没有闲暇作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理研究的,他们要找的确实就是武器。而衡量武器优劣的标准当然是效果,也就是看某种武器对解决中国的问题“灵”不“灵”;中用不中用。那时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向西方输入了好多在西方曾经很

“灵”的武器,拿到中国来就不“灵”了,因为所有这些武器都是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做论证的理论,而中国已经没有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了。“学生”希望也像“先生”一样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先生”却要“学生”做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国人拿着这些武器,根本看不清中国何以落到如此地步的症结,按照这些理论制定的方案也一个一个地碰壁。在这种走投无路的处境下,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也产生于西方,但它不是为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辩护的理论,而是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理论,它的视野比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广阔无比。用这种理论看世界、看中国,许多过去解不开的谜顿时就解开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从根本方向上弄清了。中国共产党开“一大”的时候只有十三个代表,而且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全国也只有五十多个党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指导中国革命,仅仅花了二十八年就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如果说,当时“引进”的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赝品,而这种赝品居然有如此翻天覆地的明效大验,岂非神话?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利用“五四”运动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钻了空子,“乘虚而入”的。这也不能服人。且不说中国传统文化“断裂”之说就是耸人听闻的不实之词,极而言之,即使真的“断裂”了,成了真空了,为什么别的外来理论不能“乘虚而入”,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马克思主义独能如此?有人说这是靠武力。这也说不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开始没有一枪一弹;后来有了军队,也比敌人的武力弱小得多,“三座大山”拥有的武力不知要强多少倍。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了。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来解释如此大事,如何说得通?

4.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走样”的问题?当然有。如果认为只有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不爽毫厘才算不“走样”,那么“走样”的事实确实存在。但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走样”:一种是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朝着倒退的方向“走样”。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是倒退,是思维水平的降低。一种是从根本上坚持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又有所前进。这是大好事。不允许后一种“走样”,就等于禁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把马克思的思想视为化石。如果把这种“走样”也看成罪过,那么第一个难辞其咎的就是马克思本人。马克思的思想也是活的,也在发展,他的哲学本质上就是批判的,不仅批判别人,也经常批判自己,自己也常常“走样”。如果马克思今天还健在,他还会一字不差地复述一百多年前的每一句老话么?马克思自己可以根据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做一些“走样”的事情,为什么他的后继者就没有这个权利呢?